香港電台第五台
《長進課程：解密秦朝》
主持：馮天樂博士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）、
黃好婷

第一講：《尋秦記》其書其戲

引言

穿越時空的現代科技想像，與戰國末年的權謀征伐相遇，黃易以歷史重構的敘事策略，開創了華文通俗文學的新路向。秦朝是中國歷史上首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，其興亡之謎，一直是史學與文學探討的焦點。

本講聚焦《尋秦記》的文學原著、影視改編及其與正史的對話，探討其如何確立「歷史穿越」這一文類範式，並分析其在跨媒介改編過程中，核心敘事策略的調適與轉化。

一、文學開拓：《尋秦記》的誕生與核心設定

自 1994 年起，《尋秦記》於香港博益出版社旗下雜誌《武俠世界》連載，至 1996 年完結，全書計 25 卷。作者黃易（本名黃祖強，1952-2017）融合了科幻設定、武俠元素、歷史演義與情色敘事等方法，創造了《尋秦記》，被視為華文「玄幻小說」與「歷史穿越小說」類型的重要先驅，當時極具顛覆性。

來自 21 世紀的特種部隊精英項少龍，因參與軍事時光實驗，意外地穿越了時空，回到戰國末年之趙國，捲入秦國權力鬥爭，並將趙國孤兒趙盤扶植為秦王政。此設定並非單純的「回到過去」冒險，而是叩問一個認識論問題：當現代人的知識、技術與價值觀，置入階級森嚴的古代社會，將引發何種文化碰撞？這使小說超越傳統武俠「快意恩仇」的範疇，成為探討時間旅行悖論（temporal paradox）與歷史偶然性的思想實驗。

二、顛覆與建構：《尋秦記》的歷史重寫法則

黃易在處理歷史時，展現獨特的敘事邏輯，讓虛構情節與史實事件交織，形成「史實為骨、虛構為肉」的敘事結構。

1. 歷史框架下的關鍵虛構

小說內最大膽的文學創造，莫過於「李代桃僵」的情節——真實的嬴政因故身亡，項少龍遂以趙國孤兒趙盤頂替其身份，最終登基為秦始皇。此設定純屬虛構，與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所載「秦始皇帝者，秦莊襄王子也」截然不同。然而，這一虛構為秦始皇日後的猜忌性格與高壓統治，提供了一種文學化的心理解釋：一位深恐身世敗露的「假秦王」，其暴政或源於內在的身份焦慮與補償機制。原著中，趙盤在登基後，逐漸疏遠項少龍，並展現出對權力的極度渴求，與對背叛的過度敏感，隱約呼應此「冒充者焦慮」的敘事邏輯。

2.真實人物的創造性演繹

小說將呂不韋、嫪毐、李斯、韓非等歷史人物，納入項少龍的人際網絡，並虛構其互動關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項羽在原著中，被設定為項少龍收養的孤兒「項寶兒」，此為完全文學想像。據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……其季父項梁，梁父即楚將項燕，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」項燕為項梁之父、項羽之祖父。黃易將項羽改寫為項少龍之養子，旨在建立跨越秦漢的敘事連結，強化「歷史循環」的宿命感。

三、從文字到螢幕：影視改編的策略演變

《尋秦記》的跨媒介轉譯，反映了不同時代對歷史敘事與英雄形象的理解差異，涉及媒介特性、文化審查與市場定位的複雜協商。

1.2001 年電視劇版（古天樂主演）

此版已成華語穿越劇的經典範本。為適應電視媒介的公共性與家庭觀眾的接受習慣，編劇進行多項關鍵改編：

・主人公形象重塑

原著中風流多情、手段靈活的項少龍，被改編為忠誠專一、重義輕利的俠義英雄。此一改編並非單純的道德淨化，而是類型轉換的策略——將成人向的武俠小說轉化為適合闔家觀賞的電視劇，強化觀眾的道德認同與情感投射。

・敘事簡化與角色整合

原著龐雜的人物關係被大幅精簡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刪除紀嫣然一角。紀嫣然在原著中為項少龍之正妻，兼具才學與武藝，是黃易筆下「才女」原型的典型（類比《大唐雙龍傳》之師妃暄）。電視劇將其智慧屬性轉移至琴清（郭羨妮飾）身上，並強化其與項少龍的情感專一性。此外，反派連晉與嫪毐的功能部分合併，以集中戲劇衝突，符合電視劇的敘事經濟原則。電視劇同時大幅擴充烏廷芳（宣萱飾）之戲份，使其成為女主角之一，此為原著所無之重構。

・風格調整

強化喜劇與冒險元素，加入現代口語幽默（如項少龍以現代成語與古人對話製造笑料），弱化原著中的情色描寫與複雜政治陰謀。此改編涉及香港電視審查制度與黃金時段收視策略的考量，而非僅是藝術選擇。

2.電影版（2021）：平行時空的敘事實驗

由古天樂監製並主演的電影版《尋秦記》籌備多年，最終呈現一個全新的「平行時空」故事：劇情回溯至現代，當年時光實驗的發明者 Ken，因事故蒙受不白之冤，身陷囹圄 20 年。出獄後，他率隊穿越回秦朝，意圖刺殺並取代秦王政，以篡改歷史來彌補個人損失。此舉迫使已歸隱的項少龍再度出山，以保護歷史，其與琴清所生之子亦捲入事件。電影版試圖延續電視劇的情懷效應，同時引入科技倫理與歷史修正主義等議題。電影以「平行時空」迴避此問題，卻削弱了原著「歷史不可違」的宿命張力。該片上映後口碑兩極，部分評論認為其過度消費情懷、敘事結構鬆散，反映出跨媒介改編中創新與忠實之間的內在張力。

<u>四、虛實之間：文學想像與歷史真實的邊界</u>

《尋秦記》最值得深思之處，在於其「七分虛構，三分史實」的敘事策略，所引發的認識論張力。這種對歷史的「改寫」僅是娛樂化的戲說，抑或具有更深層的文化意義？

1.對「歷史必然性」的敘事解構

黃易透過項少龍的介入，質疑了傳統史書中「秦必一統」、「嬴政必暴」的線性敘述。在小說中，統一大業、焚書坑儒等重大事件，皆與一個現代人的偶然介入緊密相連。這並非

要推翻歷史研究，而是以思想實驗的形式揭示：所謂「歷史大勢」，實由無數偶然、誤判與個體選擇交織而成，充滿變數與博弈。此處需區分兩個層次：在歷史哲學層面，這涉及歷史決定論（historical determinism）與個人能動性（agency）的辯證；在科幻敘事層面，這則是「時間線自我修正」敘事模式的通俗演繹——項少龍試圖改變歷史，卻發現自己的行動恰恰促成歷史按其已知軌跡發展。

2.通俗歷史敘事的啟蒙價值

對無數讀者而言，《尋秦記》是接觸戰國史的入門。呂不韋如何由商人而為相國？嫪毐之亂為何撼動秦廷？這些情節激發了公眾對真實歷史的探究興趣。成功的歷史題材創作，不在於還原史實，而在於捕捉歷史人物的精神氣韻，進行合理的藝術塑造，使觀眾先產生共情，繼而願意深入嚴肅史學的領域。然而，必須指出文中「焚書坑儒」的複雜性。傳統史觀將此視為秦始皇暴政的標誌，但近代以來史學界提出細緻辨析：「焚書」據李斯建議，主要針對私藏《詩》《書》及百家語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在其列，且官方保留副本，「焚書」的政治象徵意義或重於實質毀滅；「坑儒」一事，顧頡剛主張實為「坑方士」，即懲治欺瞞始皇的術士群體；李開元等當代學者進一步質疑其規模與性質。然而，這些新說並非史學定論，關於「坑儒」對象是否包含儒生、「四百六十餘人」的數字是否誇大，學界仍有爭議。小說與影視作品沿用「焚書坑儒」的傳統說法，反映的是文化記憶中的負面形象，而非當代史學共識。讀者應注意此間差異，避免將文學演繹直接等同於歷史事實。

<u>結語</u>

《尋秦記》及其跨媒介改編的成功，證明歷史題材具有持久的敘事魅力。它如同一個多稜鏡，折射出不同世代對身份認同、科技倫理與個人歷史處境的關切。然而，文學藝術追求「情感的真實」與「敘事的自洽」，歷史研究則致力於基於文獻證據的「事實的真實」。欣賞《尋秦記》的文學創造之餘，我們更應培養批判的歷史意識，清晰區分文學虛構與歷史實相——唯有如此，方能在虛實交織的敘事中，真正追尋秦朝興亡的歷史謎底，並反思我們自身與過去的複雜關聯。